

壮服“三制”实物考

樊苗苗¹, 刘瑞璞²

(1. 广西民族博物馆, 广西 南宁 530028; 2.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通过对广西民族博物馆壮族服饰标本的整理和壮族传统服饰保存状况的田野调查发现, 壮服存在“衣+裙”“衣+裤”和“衣+裙+裤”3种基本组配形制。从“衣+裙”的原生性、“衣+裤”的输入性到“衣+裙+裤”的融合性发展脉络, 说明壮族服饰“为我所用”受发展民族独特性文化观念的影响, 壮族服饰“三制”也是“一体多元”中华文化特质的生动实证。

关键词: 壮服三制; 原生性; 输入性; 融合性

中图分类号: TS 94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1)06-0515-07

Research on "Three Kinds of Form" Based on Substances of Zhuang Costumes

FAN Miaomiao¹, LIU Ruipu²

(1. Anthropology Museum of Guangxi, Nanning 530028, China; 2. College of Fashion Art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Zhuang costumes specimens in Anthropology Museum of Guangxi and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Zhuang traditional costum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basic matching systems: "coat + skirt" "coat + trousers" and "coat + skirt + trousers". From the original nature of "coat + skirt", the non-original nature of "coat + trousers" to the integration of "coat + skirt + trousers", it shows that the Zhuang costumes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uniqueness. The "three kinds of form" of Zhuang costumes is also a vivid demonstr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and unity".

Key words: three kinds of form of Zhuang costumes, original nature, non-original nature, integration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最多的民族, 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人口分布状况,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壮族服饰文化。壮族服饰因地域性而形制各异, 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 突出特点是“少装饰多组配”。对比相邻的苗族、瑶族服饰, 壮族服饰几乎没有装饰, 但出现了“衣+裙”“衣+裤”“衣+裙+裤”3种典型组配方式。一个古老民族的服饰剥离了表面的装饰物, 出现不同类型的服饰形制和组配方式, 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从形制看, 传统服装有两种基本形态: ①衣裳

连属制, 即上衣下裳连为一体的袍制, 如深衣、袍服等; ②衣裳分体制, 即上衣下裳分开为两部分, 穿在上身的统称为上衣, 下身搭配有裙或裤, 统称为裳。“上衣下裳是中国最早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这种上衣下裳制, 一直保留到以后的很长时间”^[1]。先秦时期, 又出现了衣裳连属的深衣, 而后逐渐发展成袍服式样。壮族服饰从远古至今均为衣裳分体的“上衣下裳”制, 随着历史的发展, 壮族服饰形制也产生了不同的类型, 但从未出现过上衣下裳连属的“袍制”。

收稿日期: 2020-10-07; 修订日期: 2021-10-16。
基金项目: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NHfZ20190110);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项目 (21FMZ034)。
作者简介: 樊苗苗 (1984—), 女, 副研究馆员,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东南亚服饰文化。Email: moyao99@qq.com

文中壮服标本包括广西民族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广西边疆民族博物馆、靖西市壮族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等。通过对当下尚存的壮服标本的整理,以及对壮族传统服饰文化保存状况的田野调查,壮族服饰可以归纳出“衣+裙”“衣+裤”和“衣+裙+裤”3种典型的组配形式。这3种组配形式主要集中于壮族女服,壮族男服整体表现为“衣+裤”形制。“纵观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变迁史,就会发现服饰变迁呈男快女缓的态势,特别是多民族杂居的南方更为明显,如水族、苗族、侗族、瑶族、畲族等,壮族男装很难找到民族特色的标本,女装却保存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壮族女服是壮族服饰文化生存的最后一块领地……”^[2]因此对壮族女服标本的梳理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大多数壮服标本多属于“外婆的压箱底”,传承时间不超过5代(约100年),多数为近代制品。但壮服标本依然传承了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对标本形制3种类型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解读壮族服饰发展的历史文脉。

1 “衣+裙”形制的原生性

壮服“衣+裙”形制是对中华民族“上衣下裳”制的同形同构,“裳”在古代是指“裙”。壮族先民“上衣下裙”在文献中多次被记载,宋代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卷六载:“钦州村落,土人新妇之饰,以碎杂彩合成细毯,文如大方帕,各衫,左右两个,缝成袖口,披著以为上服。其长止及腰,婆婆然也,谓之婆衫。其裙四围缝制,其长丈余,穿之以足,而系于腰间。以藤束腰,抽其裙令其短,聚所抽於腰,则腰特大矣,谓之婆裙。”^[3]文中的钦州土人新娘服的“婆衫”“婆裙”表明宋代的壮族先民已穿着“上衣下裙”;明代天启《滇志·卷三十》记载“侬人……妇人衣短衣长裙,男子首裹青帨,衣粗布如絺。”^[4]文中记述了女子短衣长裙的形象。除了长裙款式外,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僮……性质粗悍,露顶跣足,花文短裙,鸟语夷面,自耕而食,又谓之山人……”^[5]描述了壮族先民着“短裙”的形象并证实明代壮族先民“上衣下裙”的形制逐渐得到普及。清代,壮族服饰“上衣下裙”的形制已经定型,并发展至兴盛阶段。清康熙年间,汪森《粤西丛载》记载:“南丹溪峒之人呼为僮……椎髻跣足,穿耳悬环,男女如之……男服者,短窄衫,细褶裙,其长过膝;女服者,青衣,花纹小袂裙,以红绿绉缘,长及地。”^[6]描绘了壮族男女服饰都是“上衣下裙”形制,

不同的是男子是“短衫长裙”,女子则是“青衣小裙”。在清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中,不仅有壮族先民“衣+裙”服饰形制的图像描绘,也有相关文字记载。如:贺县(今贺州市)僮妇“……短衫,系纯锦,裙,华丽……”;思恩府(今广西平果县旧城)属依妇“……短衣布裙……”;西林县皿妇“着花领衣,系绿裙……”;西林县侠妇“……红衣广袖,外系绿裙……”;广南府(今广南县)等依妇“短衣密纽,系细褶桶裙……”^[7]等,均表明“衣+裙”形制在清代壮族服饰中占主体地位。

然而,对壮服标本梳理的结果与文献记载的清代壮服形制形成巨大反差,实际壮服“衣+裙”形制标本数量并不多,并且成了壮服原生形制的传承载体。“衣+裙”形制标本属地主要有龙胜、三江、大新、文山、马关等,其中龙胜“衣+裙”形制为清代流行式样,更加证实了其对原生文化的传承。

“衣+裙”形制的壮族女服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衣+裙”形制壮服中“衣”也因地域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样式特征。从领襟结构可以分为对襟和右衽大襟两种形制,其中对襟又有开襟与合襟之分。其中三江女服为开襟,清代龙胜、大新、文山女服中的衣为合襟,大新壮族女服中的内衣和马关女服则是右衽大襟。从衣身长度看,龙胜、三江和文山的偏长,下摆至臀部位置;大新和马关的衣长偏短,下摆只到腰部,在劳作时腹部腰带会若隐若现。“裙”整体呈现褶裙样式,裙长中等偏长,多至膝盖下方小腿处,长者达脚踝处。壮裙通常会有褶,百褶裙几乎是西南少数民族女服的标志之一,壮族也不例外,裙褶的宽度和密度也因地域而不同。清代龙胜和三江女服的百褶裙褶裯细密,大新和文山的裙褶稍宽,马关女服的长裙通过不同面料拼合而成,且裙褶更宽。值得注意的是,裙身相对较短的三江和大新女服配有脚套或绑腿。

在对壮服“衣+裙”形制标本进行地域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散点式与区域式并存的状态。散点式以大新县宝圩乡壮族女服为典型。大新位于广西的南部山区,其周边如大新县龙门乡三联村、硕龙镇的壮服标本形制多以“衣+裤”为主,因此大新宝圩壮族女服具有独特性,即点状分布。区域式主要有两处:①广西的龙胜各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贵州的从江县,三县相邻,可统称为壮族聚居区的东北部区域;②云南文山的西畴、富宁、丘北、广南以及和广南相连的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和西林县,此区域位于壮族分布区域的西北部。这些地方传统壮族女服对“衣+裙”形制的恪守,不仅

从博物馆的标本上得到证实,也在当下重要的节庆盛典中得到展示。壮族聚居区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属于喀斯特地貌,历史上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也相对较少,较好地保存着壮

族服饰的原生文化。在这样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中,壮族服饰“衣+裙”形制表现出对传统“上衣下裳”形制的坚守,如清代龙胜壮族服饰保有竖纱贯首衣结构。



图1 “衣+裙”形制的壮族女服

Fig.1 Specimens of Zhuang women's clothing in the form of "coat + skirt"

2 “衣+裤”形制的输入性

壮服标本“衣+裤”形制呈现的“上衣下裤”效果,多表现为上短衣下长裤的形式,“上短衣”的下摆至腰臀部,“下长裤”为宽筒大裆,裤长至脚踝,属“衣+裤”形制的典型特征。但偶尔有“长衫+长裤”的形式,如龙州壮族女服。“衣+裤”形制在壮服标本中数量最多,不仅男女服都有,而且在不同地域不同特点的壮服中占据主导地位。实物标本呈现的状况与清代文献记载壮族男女多以“衣+裙”形制为主的情况差别甚大,可见在清代以后壮族服饰发生了巨大变化,聚焦点即是裤子的广泛使用。

2.1 男服

对博物馆标本和田野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壮族男服不仅在形制上,而且在款式、装饰、色彩等方面的丰富程度都比女服逊色,表现出壮族男服的统一性、稳定性。“过去,壮族男子服装的民族特色比较明显,因地域和生活习俗不同呈现差异,如今已基本汉化,穿戴打扮一如汉族男子。”^[2]可见,壮族男服的“衣+裤”形制属于“基本汉化”后的形象,汉族服饰文化对壮族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壮族男服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衣+裤”形制的壮族男服如图2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那坡、隆林、西林、广南、大新的壮族男服皆为“上短衣”“下长裤”式样,裤子为典型的汉化缅甸裆裤(宽腰头、宽腰围、宽裤口、裆部肥大)^[8]样式。除了大新男衣为右衽大襟短衫外,那坡、隆林、西林、广南的男衣均为立领对襟短衫样式,因此“上对襟有扣短衣,下宽腰宽筒缅甸裆长裤”成为壮族男服的基本形制特征。“



图2 “衣+裤”形制的壮族男服

Fig.2 Specimens of Zhuang men's clothing in the form of "coat + trousers"

壮族男服所呈现“对襟有扣短衣+宽腰宽筒缅甸裆长裤”的服饰形制,实际是清末民初时期壮族男服“汉化”趋势的表现,如果对照清末民初汉地服饰

形态,可发现其明显的“汉化”特征,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男子都是与时代接轨最快的团体,使得男子成为率先被“同化”的人群,故而男子的着装也随着

社会环境而变化,壮族男服汉化正是如此。“对襟有扣短衣+宽腰宽筒缅甸裆长裤”的服饰形制仍在当下的壮族地区坚守着,并逐渐发展成为民族礼服。

2.2 女服

虽然壮族女服“衣+裙”形制在清代壮族服饰中具有主体性地位,但无论是博物馆馆藏的壮族服饰标本,还是对当前仍在传承的壮族服饰调查,发现“衣+裤”形制已成为许多壮族妇女认同的传统服饰,其分布的区域覆盖了大部分壮族传统聚居区,包括广西壮族分布的大部分地区和贵州、云南壮族分布的部分地区。其中在壮族传统聚居区的东部、中部、南部、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衣+裤”形制为主要着装方式,可见“衣+裤”形制是壮族传统服饰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代,“衣+裤”形制仍在壮族传统村寨中传承,已经成为壮服形制的重要组配,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然而,在古籍文献中关于壮族服饰“衣+裤”形制的记载非常少,出现的时间基本为清末,由

此推测“衣+裤”形制的定型要晚于“衣+裙”,所以能够保留下更多的实物标本,分布的范围也最广,是最能反映壮族服饰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

现今,“衣+裤”形制仍在龙胜、天峨、南丹、凌云、隆林、西林、靖西、那坡、大新、龙州等地的传统壮族村寨中传承。“衣+裤”形制的壮族女服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衣身大部分以中短款为主,衣长过腰至臀。除了龙胜女服为对襟式样外,其他地区都是右衽大襟。衣长除了龙州女服是“袍”式长款外,其他地区都是中短款,衣长都超过腰线至臀部上方位置;女裤样式和男裤相同,即宽腰围、宽裤筒、裆部肥大的缅甸裤样式。在文献资料中,关于古代壮族服饰“上衣下裤”形制的记载非常少,时间基本为清末至民国之后,由此可以推测着裤是壮族服饰历史发展过程中距今最近的阶段,并且“衣+裤”形制是清末民初受汉族服饰文化影响的结果,且逐渐发展成为壮族服饰的主流。



图3 “衣+裤”形制的壮族女服

Fig.3 Specimens of Zhuang women's clothing in the form of "coat + trousers"

2.3 缅甸裤的民族文化同构

对壮服标本结构进行系统研究发现,壮族服饰中无论男服还是女服,裤子结构大都表现出缅甸裤的特征,即“整裁整用”的平面结构。缅甸裤源自北方少数民族,其结构形制受北方民族放牧、狩猎与日常骑马的生活方式影响。随着北方民族统治的清王朝建立,缅甸裤成为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且逐渐发展成熟。“清代缅甸裤(宽腰头、宽腰围、宽裤口、裆部肥大)成为主流,基本成为清末民初的主要裤装形制”^[8]。缅甸裤在《皇清职贡图》中已有类似的图像出现,但缺乏实物证据。自雍正年间开始在西南边疆地区执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至清末民国时期结束^[9],这个过程“由于重视传播内地文化……大体上实现了与内地文化的对接”^[10]。缅甸裤带着满汉文化融合的基因对边疆民族生活的影响逐渐扩大,并被西南少数民族穿着。

实质上,缅甸裤成为普及性的壮服组配,主要

在时局动荡的清末民初。清末民初,剪发易服蔚然成风,象征着与清王朝封建势力的决裂,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当政者的需要,出现了各种风俗改良活动,“为推进风俗之改良,对于违背改良之行为,新桂系尽管也主张以教育待之,但更多的是金钱乃至刑事的处罚……新桂系时代广西边疆地区风俗改良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以汉族文化同化少数民族的特点。”^[11],所以风俗改良的核心是“汉化”。《龙胜县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黄祖瑜任县知事,宣告剪男长辫,并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裙着裤。”^[12]表明了清代壮族女服“衣+裙”形制到近现代“衣+裤”形制变化的原因,“衣+裤”形制是外来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服饰形制的变化也证实了一个时代的更迭。类似的情况在云南壮族聚居区也有发生,“1938年4月1日起,为了能够执行《丘北县沙族风俗改良规约》和《县政府布告》的有关规定,逢云南邱北锦屏镇圩日

都有警察、乡丁在四大城门设卡,凡沙人妇女穿筒裙来赶街就强令脱下,内未穿裤的剪半截拿去烧,如有违抗就照规约论处。”^[13]可见,壮服“衣+裤”形制是受到时代更迭下社会、政治、文化巨大变革的影响而产生的。清末民初所改变的“上衣下裤”形制不仅被壮族继承,而且作为汉族服饰的“右衽大襟衣+大腰宽筒裤”标准形制在壮族传统聚居区得到推广,形成了近现代壮族服饰的整体格局,成为现当代龙胜壮族群众所认同的壮族传统服饰经典。现今壮族男女服饰中的宽腰大裆宽筒长裤,结

构与清代的连腰缅甸裤类同并非偶然,而是在壮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可见,缅甸裤并不是壮人的发明,而是在壮汉文化交流过程中对汉人服饰的一种学习借鉴,然而因为壮族传统布幅宽度局限,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壮族大腰宽筒缅甸裤类型。壮族着裤子(尤其是缅甸裤)的历史受到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是随着汉文化深入壮族聚居区而导致壮族日常穿着的变化,而缅甸裤是从满族的游牧文化而来,较晚进入壮族生活,是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入的表现。天峨壮族缅甸裤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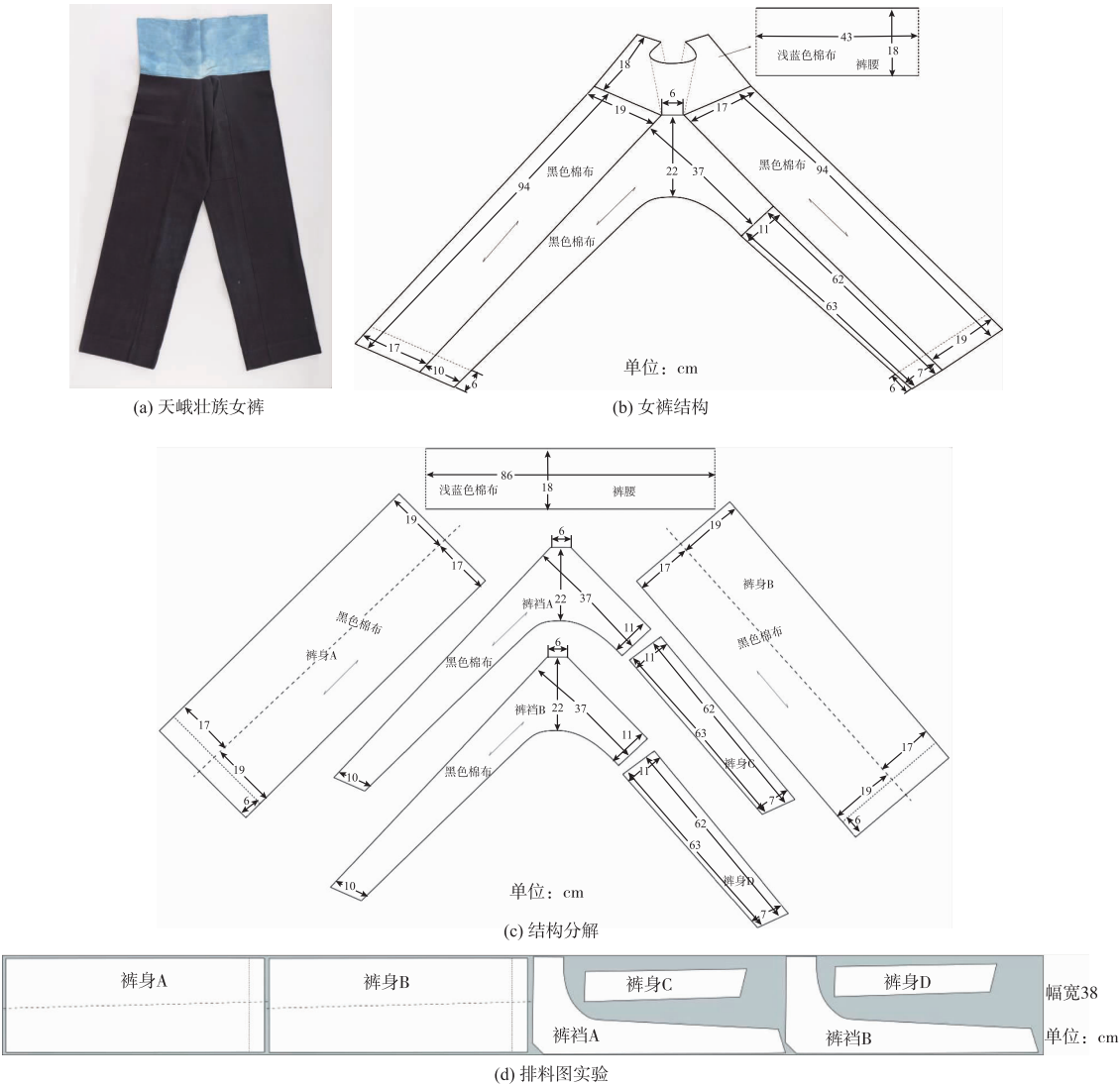


图 4 天峨壮族缅甸裤个案分析

Fig. 4 Caseanalysis of Tian'e Zhuang women's trousers

3 “衣+裙+裤”形制的融合性

“衣+裙+裤”的服饰形制在其他少数民族中并不多见,但在壮服中普遍存在,表现出浓郁的壮族特色。“衣+裙+裤”形制在着装后呈现的是衣、

裙、裤的 3 重搭配效果,类似壮族居住的杆栏式建筑的多层结构,在隆林(沙梨乡)一带也被形象地称为“三层楼”。通过对标本的整理,发现“衣+裙+裤”形制虽然呈现 3 层搭配的共性,但也因不同地域而各有不同,表现出同一形制下的多样性特点。

“衣+裙+裤”形制壮服主要分布在融水、隆

林、那坡、广南、西畴等地,“衣+裙+裤”形制的壮族女服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以看出,“衣”的领襟结构有对襟和右衽大襟,对襟又有开襟与合襟的区别。其中:融水壮族女服呈现开襟式样;西畴壮族女服呈现合襟系扣式样;其余地区都以右衽大襟为主。那坡壮族女服标本在右衽大襟上衣外罩有一件对襟马甲,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裙”以褶裙样式为主,融水、隆林、广南的褶裙是密褶形的百褶裙,类似普力特褶(pait);那坡褶裙呈现出宽松的褶皱,类似塔克褶(tuck)。裙身长度亦不相同,融水、隆林的百褶裙为短款,约至膝盖或以上;那坡、广南、西畴的褶裙为长款,长至小腿,甚至到脚踝。那坡百褶长裙在着装时,会把裙摆往腰处折叠压紧,

形成裙身中空的灯笼状,折叠后的形态犹如一个大口袋,在日常生活中也兼具收纳功能。那坡壮族女服如图 6 所示。西畴壮族女服如图 7 所示^[14]。西畴壮族女服中有与那坡壮族女服类似的着装方式,不同的是西畴壮族女性把裙子从正面由下往上翻折后左盘右旋,绕结成墩,翘摇如鸟尾。这样的款式在古代称为“尾濮”,亦为“骆越”,壮语意为“鸟崇拜的越人”^[14]。无论是那坡壮族女服具有收纳物品功能的裙子式样,还是西畴壮族女服具有的象征骆越文化的裙子式样,实际上都是把长裙变成短裙的一种着装。当长裙因特色的着装方式变成短裙之时,壮族服饰“衣”“裙”“裤”的 3 层叠加效果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图 5 “衣+裙+裤”形制的壮族女服
Fig. 5 Specimens of Zhuang women's clothing in the form of "coat + skirt + trousers"



图 6 那坡壮族女服

Fig. 6 Napo Zhuang women's clothing

在壮服“三制”中,“衣+裙+裤”形制特殊性大于普遍性。其分布状态和“衣+裙”形制有一定的重合,呈区域式分布。“衣+裙+裤”形制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①融水壮族服饰分布的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与融水接壤的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从江县;②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那坡县、靖西市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辖区。融水壮族女服所在的区域是云贵高原苗岭山地,那坡、隆林、广



图 7 西畴壮族女服

Fig. 7 Xichou Zhuang women's clothing

南、西畴壮族女服所在的区域属于云贵高原六韶山脉余脉,两处地域的共同特征,即山林茂密、河谷众多、生产生活资料较为贫乏,与世隔绝。一个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对民族服饰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彼得·波格达尔夫等^[15]指出:“服装的穿着者不仅关心他自己的个人趣味,而且也顺应地域的需要,以符合他的环境标准。”事实上地理环境的客观条件决定着穿着者的“个人趣味”。生活

在云贵高原苗岭山地和六韶山脉余脉的壮族虽然分别位于壮族大聚居区的东北部和西北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共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共同文化背景下的服饰形制。生活在这两个区域的壮族人以山地农耕自然经济模式为主,“山地农耕”较之于“平地农耕”,需要在山地行走,下身的活动幅度更大,再加上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服装形制的多变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壮人原属上衣下裙传统组配的基础上,因壮汉文化交流而引入裤装,高寒气候又使裙和裤的组合成为可能,使得“衣+裙+裤”形制成为融合性极强的壮服特有组配,表现出壮族文化的融合特征。

4 结 语

壮族服饰形制呈现的3种不同类型是长期以来民族融合的结果,通过对标本的系统整理,从“衣+裙”的原生性、“衣+裤”的输入性到“衣+裙+裤”的融合性,清晰地勾勒出壮族服饰文化的历史脉络,并指出3种形制是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共融发展的见证。壮汉文化交流共融自明清后更加频繁,在服饰上表现为对汉文化产生了包容、吸收、消化、融合,但“袍服”始终没有纳入壮族服饰系统,而对“裤装”却情有独钟,说明壮族服饰“为我所用”是建立在民族独特性的文化理念之上。壮服“三制”正体现了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反映了民族文化融合的传承之道。它们虽有传承的时间逻辑,但并没有因后者的产生而让前者消失,也没有因“壮汉交流”而削弱壮文化,反而更加丰富了壮族的文化内涵。壮服“三制”表现形态是在同一时代的多样化呈现,是不同历史时期壮族服饰民族交流和发展的物证,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生动实证。

参考文献:

- [1] 周锡保. 中国古代服饰史[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86:3.
- [2] 陈丽琴. 壮族服饰文化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7.
- [3] 周去非. 岭外代答:卷六[M]. 钦定四库全书版. 北京:

中国书店,2018:206.

- [4] 刘文征. 滇志:卷三十[M]. 古永继,校点. 王云,尤中,审定.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1001.
- [5]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七卷·广东下[M]. 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85.
- [6] 汪森. 粤西丛载校注:下[M]. 黄振中,吴中任,梁超然,校注.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1028.
- [7] 傅恒. 皇清职贡图[M]. 沈阳:辽沈书社出版,1991.
- [8] 乔滢锦,刘瑞璞. 清末民初传统裤装结构及中西裤装结构比较的研究[J]. 服饰导刊,2018(5):25-34.
QIAO Yingjin, LIU Ruipu. 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trous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J]. Clothing Guide, 2018(5):25-34. (in Chinese)
- [9] 《壮族简史》编写组. 壮族简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88.
- [10] 方铁. 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2):68-80.
FANG Tie. On the evolution from Jimi Zhi Ce to Tuguan Tusi[J].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2011(2):68-80. (in Chinese)
- [11] 王晓军. 边疆视域下新桂系时代广西的风俗改良[J]. 广西民族研究,2013(2):123.
WANG Xiaojun. Customs improvement of Guangxi in the time of New Guangxi cliq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ontier sight[J]. Ethnic Studies in Guangxi,2013(2):123. (in Chinese)
- [12] 龙胜县志编纂委员会. 龙胜县志[M]. 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2:2.
- [13] 杨宗亮. 壮族文化史[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86.
- [14] 李元君. 美丽的锦绣:壮族服饰[M]. 南宁:接力出版社,2012.
- [15] 彼得·波格达列夫,胡妙胜. 作为记号的服饰——在人种学中服饰的功能和结构概念[J]. 戏剧艺术,1992(2):42-45.
BOGDALEV P, HU Miaosheng. Clothing as a marker-the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cepts of clothing in ethnology[J]. Journal of College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1992(2):42-45. (in Chinese)

(责任编辑:卢杰)